

# 試論文學史寫作的可能性

## —從德國文學史談起—

王建/Wang Jian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德語系 教授

Department of Germ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 【摘要】

論文從追溯文學史寫作傳統的形成過程出發，以德國文學史著作為例，展現文學史寫作的傳統，分析文學史寫作面臨挑戰的原因所在，探討文學史寫作面對困境所做的創新嘗試及其成敗。依託伽達默爾的闡釋學理論，論文將文學史寫作看作寫作者和寫作對象之間相互對話的共生關係，從而就文學史寫作提出自己的見解。

### 【關鍵詞】

文學史寫作、闡釋學、對話、共生

### 【Abstract】

Retracing the origin of literary historiography and taking the books of history of German literature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tradition of literary historiography, analyses why literary historiography has to face the challenge and explores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in the attempts to innovate in the face of the difficulties. Based on Gadamer's hermeneutics, this article thinks of literary historiography as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in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writer and writing objects and thus puts forward the solution of its own to the literary historiography.

### 【Keywords】

literary historiography, hermeneutics, dialogue, symbiosis

文學史著作是文學研究領域最重要的基礎書籍之一，它們範圍大小、跨度長短、內容詳略各不相同，能夠給讀者提供特定時期和地域的文學變遷的概貌，深受文學研究者和愛好者的關注，這正是文學史著作總是層出不窮的原因。不過文學史著作的地位逐漸發生了變化，學術性漸漸讓位於資料性，從研究型專著逐漸向參考性的工具書過渡，這一特點從文學史寫作的一系列較為寬鬆的學術規範上可以看出。從積極的角度來看，文學史著作可以擺脫高頭講章的地位，從學術性轉向普及性，得到更多的讀者的喜愛，從消極的角度來看，文學史著作失去了學術色彩，更確切地說，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文學史寫作的意義遭到懷疑，導致文學史的困境。

文學史的名稱來源於十七世紀的拉丁文 *Historia lit(t)eraria*，用來指關於所有文字作品的傳記和文獻大全，由此派生出來的德文詞是 *Lit(t)erärgeschichte*，後來才出現 *Literaturgeschichte*（文學史）的提法（Schönert 2007: Bd.2, 456）。文學史的雛形可以上溯到古羅馬的帶有作者介紹的經典文本彙編或者作家和作品目錄，中世紀仍然沿襲這一傳統。文藝復興之後出現了帶有歷史和文學介紹的作家目錄和帶有生平介紹的文獻目錄，涵蓋所有的文字作品，比如像康拉德·蓋斯納（Conrad Gesner 1516–1565）的《萬有文庫》（*Bibliotheca universalis* 1545–1548），它們大多按照主題範圍或者編年順序編排，逐漸以國家為編纂範圍，這些著作起初作為博物學的一部分，後來獨立成書。德國的文學史著作正是出現於這一時期，代表作是蘭姆貝克（Peter Lambeck 1628–1680）按照編年式順序撰寫的《文學史》（*Prodromus historiae literariae* 1659），文學史的拉丁文概念正是由他提出（Marsch 1986: 11–12）。從啟蒙運動時期開始，文學史觀發生了重大變化，文學的概念逐漸縮小到文學作品，文學史真正成為文學的歷史，同時赫爾德提出文學與時代的關係，主張文學具有歷史性，文學史不是簡單地排列作家生平和作品介紹，而是呈現為一個發展的過程，力圖揭示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內在關聯性，這一歷史哲學的觀點在施萊格爾兄弟的文學史理論和實踐中進一步明顯起來，在黑格爾的哲學中通過絕對精神的發展過程得到最徹底的表現。十九世紀的文學史開始有意識地展現這一歷史觀，從而讓文學史從簡單的資料彙編走向具有理論背景支持的學術著作。從蓋爾維努斯（Georg Gottfried Gervinus 1805-1871）的《德國文學史》（*Geschichte der poetischen National-Literatur der Deutschen* 1835-1842）經過黑特納（Hermann Theodor Hettner 1821-1882）的《十八世紀文學史》（*Literaturgeschichte des achtzehnten Jahrhunderts* 1856-1870），直到舍勒（Wilhelm Scherer 1841-1886）的《德國文學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1883）可以看作這一歷史觀的體現，

不過歷史哲學逐漸為歷史主義所取代，目的論讓位於實證主義。進入二十世紀之後，隨著文學概念的擴大，出現了兩個不同的傾向，一方面是以形式主義為代表的文學自律論，按照文學內部規律來描述文學的發展過程，另一方面是立足於外部影響論，主要是上半葉的思想史學派和下半葉的社會史學派（Rosenberg 2007：Bd.2，458—463；Freytag u. Schönert 1998：483—486）。文學史寫作的興盛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但是在七十年代興起的文學理論熱潮中，文學史的學術內涵遭到質疑，新的文學史雖然依舊不斷出現，不過它們大多或是延續原先的多卷本文學史，或是強調服務於教學目的，滿足於參考書定位，很少再去突出自己的學術性。

文學史的困境首先是歷史學的困境，即任何關於歷史現象的研究都面臨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這就是歷史研究的真實性問題，或者說歷史是否可以重構的問題。克羅齊（Benedetto Croce）提出“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克羅齊 1986：2），指出“當代性不是某一類歷史的特徵，而是一切歷史的內在特徵”（克羅齊 1986：3），“歷史存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它的資料就在我們自己的胸中，因為只有在我們自己的胸中才能找到那種熔爐，使確鑿的東西變為真實的東西，使語文學與哲學攜手去產生歷史”（克羅齊 1986：14）。克羅齊的目的在於凸顯所有歷史研究都無法擺脫當代的視角，歷史的真實不是由資料堆積起來的真實原貌，而是思想活動中的當下真實。後現代理論的代表人物利奧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在他的代表作《後現代狀態：關於知識的報告》中質疑西方思想傳統中的整體性（或者稱為總體性）概念，他對表述這一整體性的元敘事或者說宏大敘事提出懷疑，矛頭指向現代性特徵的標誌——歷史性，主要是以德國的思辨傳統為代表的哲學敘事和以法國的啟蒙傳統為代表的政治敘事，他認為這些宏大敘事已經失去了它們的合法性，陷入敘事危機，在他看來，“大敘事失去了可信性，不論它採用什麼統一方式：思辨的敘事或解放的敘事”（利奧塔爾 1997：80）。<sup>1</sup>在反對整體性建構的基礎上利奧塔提倡“異質性”和“多元性”。對總體性和元敘事的懷疑動搖了傳統歷史學的基礎，即完整地建構歷史的總體脈絡和發展線索。後來的新歷史主義進一步反思這一問題，蒙特羅斯（Louis Adrian Montrose）強調文本的歷史性和歷史的文本性，他認為一方面所有的文本都源自特定的歷史時期和歷史氛圍，具有自身的歷史性，另一方面一切歷史都是通過一系列文本體現出來的，沒有所謂客觀真實的歷史，只有文本的歷史（王嶽川 2001：185），

---

<sup>1</sup> 這裡的利奧塔爾就是利奧塔（Lyotard），大敘事就是宏大敘事（*métarécit*）。

這裡的文本應該是大文本的概念。懷特（Hayden White）更認為歷史是“以敘事性散文話語為形式的一種言語結構”（懷特 2004：2），歷史研究變成了文學研究，歷史淪為語言的虛構，所以懷特的理論不再稱作歷史理論，而是稱作歷史的詩學。經過一系列對歷史研究的質疑，客觀再現的歷史學理想已經破滅，挑選史料、勾勒線索和評判褒貶都無法隱去研究者的痕跡，任何歷史研究都無法迴避客觀和主觀、歷史性和當代性、真實性和模式性、個體性和整體性這一系列選擇，當代歷史研究通常傾向於認為前者難以企及，所謂歷史研究只是後者的反映而已，這一觀點使得歷史研究呈現出相對化的趨勢。

歷史研究的相對化必然影響到文學史著作的寫作，文學史著作的真實性遭到懷疑，早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韋勒克和沃倫在《文學理論》中就對文學史的寫作提出質疑：“寫一部文學史，即寫一部既是文學的又是歷史的書，是可能的嗎？”在他們看來“大多數的文學史著作，要麼是社會史，要麼是文學作品中所闡述的思想史，要麼只是寫下對那些多少按編年順序加以排列的具體文學作品的印象和評價”（韋勒克、沃倫 1984：290）。他們提出的解決辦法是回歸到文學自身，但是這個方法依舊沒有解決文學史的根本問題。實際上文學史寫作的核心問題是文學作品的獨一無二的特點和文學史的普遍性規律之間的矛盾，由此派生出對文學史著作的一系列質疑：首先是質疑寫作者在選材、分期、評價方面的主觀性立場，其次是質疑寫作者在描述和分析中的當代視角，再者是質疑寫作者在勾勒變遷線索時的目的式、發展式或者其它理論模式，總之文學史不再被視作對以往文學變遷的勾勒和描述，而被看作撰寫者自己的建構和敘述，不是來源於文學變遷過程，而是來源於撰寫的立場、視角和方法，關注的中心從文學史講述的歷史轉向文學史的敘述方式。

面臨這一系列難題，八十年代前後的文學史理論做出了多樣化的探索，在作品與作家的高雅與通俗、經典與非經典、體裁的取捨、主題的偏愛、時代和國別的界定、受眾範圍的確定等方面提出各自的觀點、主要是借用社會史、話語分析、接受史和影響史、新歷史主義和性別研究等不同的理論模式，試圖以此來指導文

學史的寫作，不過這些努力仍然不得不面對文學史寫作的一系列難題。<sup>2</sup>文學史寫作實踐與相關的理論探討相比依舊比較傳統和保守，在理論中的諸多建議並沒有在寫作實踐中得到實現，這一方面是由於文學史寫作本身的慣性，另一方面也由於很多理論性的探索並沒有解決文學史的困境問題，同時也沒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在此僅以德國文學史為例，考察一下文學史寫作實踐是如何對文學史困境做出反映的。縱觀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比較有影響的德國文學史著作，不少文學史雖然都注意到文學史理論的熱潮，有些文學史著作對文學史理論的各種觀點還

---

<sup>2</sup> 這一時期德國關於文學史理論的主要研究有Wolfgang Haubrichs, Probleme der Literaturgeschichte, Göttingen 1979; Rainer Rosenberg, Zehn Kapitel zur Geschichte der Germanistik: Literaturgeschichte, Berlin 1981; Jan-Dirk Müller, Literaturgeschichte / Literaturgeschichte, in: Dietrich Harth / Peter Gebhardt (Hg.), Erkenntnis der Literatur. Theorien, Konzepte, Methoden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Stuttgart 1982, 第195—227頁; Michael Titzmann, Probleme des Epochenbegriffs in der Literaturgeschichte, in: Karl Richter / Jörg Schönert (Hg.), Klassik und Moderne. Die Weimarer Klassik als historisches Ereignis und Herausforderung im kulturgeschichtlichen Prozeß, Stuttgart 1983, 第98—131頁; Hans Ulrich Gumbrecht / Ursula Link-Heer (Hg.), Epochenschwellen und Epochenstrukturen im Diskurs der Literatur- und Sprachgeschichte, Frankfurt a. M. 1985; Wilhelm Voßkamp / Eberhard Lämmert (Hg.), Akten des VII. Kongresses des Internationalen Germanistenkongresses, Göttingen 1985, Bd. 11: Historische und aktuelle Konzepte der Literaturgeschichte. Zwei Königskinder? Zum Verhältnis von Literatur und Literaturwissenschaft, Tübingen 1986; Wilfried Barner, Tradition als Kategorie der Literaturgeschichte [1988], in: Ders., Pioniere, Schulen, Pluralismus. Studien zur 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Tübingen 1997, 第277—296頁; Jürgen Fohrmann, Das Projekt der deutschen Literaturgeschichte: Entstehung und Scheitern einer nationalen Poesiegeschichte zwischen Humanismus und deutschem Kaiserreich, Stuttgart 1989; Wilhelm Voßkamp, Theorien und Probleme gegenwärtiger Literaturgeschichte, in: Frank Baasner (Hg.), Literaturgeschichte in Italien und Deutschland, Tübingen 1989, 第166—174頁; Hartmut Eggert / Ulrich Profitlich / Klaus R. Scherpe (Hg.), Geschichte als Literatur. Formen und Grenzen der Repräsentation von Vergangenheit, Stuttgart 1990。



做出了反思，體現在具體的寫作細節之中，但是除了引入社會史的方法之外，完全按照新的理論框架來寫作文學史的嘗試極少見到。

從較有影響的文學史著作來看，完全從社會史角度寫作文學史的典範是格裡明格（Rolf Grimminger）主編的十二卷本《德國文學社會史》（Hansers Sozial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1980ff）和格拉澤爾（Horst Albert Glaser）主編的十卷本《德國文學社會史》（Deutsche Literatur. Eine Sozialgeschichte 1980-1997），這兩套文學史注重從社會生產和生活過程來考察文學；從女性視角寫作的有布林克·加貝爾（Gisela Brinker-Gabler）主編的兩卷本《德國婦女文學》（Deutsche Literatur von Frauen 1988），該書關注女性作家的創作；茨梅加克（Victor Zmegac）的三卷本《德國文學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vom 18. 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 1979-1985）處在社會史方法的影響下，在前言中對文學史的歷史做了一番回顧，突出自己在宗旨、選擇作品和作家，兼顧雅俗文學，尤其是將文學看作交流結構等方面的特色，值得注意的是這套文學史將起點定在十八世紀，在編者看來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更早的時期需要不同的閱讀動機和研究興趣，有些方面還需要不同的方法原則”（Zmegac 1979：XXIX）；巴爾（Ehrhard Bahr）的三卷本《德國文學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1987-1988）強調自己的新視角，在反思社會史方法的利弊之後提出自己的主張，要求回歸到文學創作和創作者，強調文學變遷的整體性，不過他同時突出多元性、當代性和主體性（Bahr 1987：Bd.1, VII-XI）；文學史領域中的常青樹，馬提尼（Fritz Martini）的《德國文學史》（Deutsche Literaturgeschichte. 18. Auflage. 1984）的前言仿佛是一篇自辯書，為自己的主觀選擇性極強的方法尋找原因，主要將這一做法歸因於作為導論式簡史的必要性，顯然作者感受到文學史理論的壓力，從而為傳統文學史的艱難處境提供了一個示例；另一個示例是德國簡裝書出版社（dtv）出版的十二卷本《德國文學史》（Deutsche Literaturgeschichte 1991-2003），它強調自己的通俗性，以此迴避文學史不得不面對的學術懷疑；至於德國文學史的經典作品，德博爾（Helmut De Boor）和內瓦爾特（Richard Newald）主編的至今未完成的多卷本《德國文學史》（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1949 起），從早期的各個分卷到新近重寫和新寫的分卷，方法有所變化，資料有所更新，但是整體架構和指導原則沒有十分明顯的區別，從這六十年的跨度可以看出文學史寫作的相對穩定性。

較為特殊的是進入新世紀之後出現的三部文學史，從篇幅來看都是單卷本的文學史，一本是由芝加哥大學教授韋爾貝利（David E. Wellbery）牽頭、集大西洋兩岸德語文學研究者編寫、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推出的《新編德國文學史》（A

New History of German Literature 2004)，16 開本，共 1004 頁；另一本是德國著名德語文學研究專家施拉弗爾(Heinz Schlaffer 1939－)撰寫的《德國文學簡史》(Die kurz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2002)，這本書確實稱得上是簡史，小 32 開本，只有 158 頁；還有一本是施耐德(Jost Schneider)的《閱讀的社會史》(Sozialgeschichte des Lesens 2004)，篇幅適中，大 32 開，近 500 頁。這三本文學史沒有迴避文學史的窘境，在對以往文學史寫作實踐做出反思的前提下各自給出了自己的回答。

施拉弗爾在《德國文學簡史》中批評現有文學史大多是多人合作撰寫，每人描述十幾年到上百年的文學變遷過程，最後形成的文學史毫無整體性可言，更像是一部論文集(Schlaffer 2002: 13)。他毫不猶豫地宣佈自己要寫德國文學的歷史，不過他對德國文學的理解與傳統的文學史大相徑庭，他區分兩種德國文學，一種是由文學研究者整理出版的文學作品構成的，另一種是由活躍在文學記憶中的文學作品構成的，他感興趣的是後者(Schlaffer 2002: 18)。在他看來“古高地德語文學 1150 年就已斷根，中高地德語文學 1450 年就已斷根，近代早期的德語文學 1770 年之後也斷了根”(Schlaffer 2002: 19)，所謂德國文學起源於八世紀只是德語文學研究者的杜撰。十八世紀是一個重要的轉折時期，“在戈特舍德和萊辛、約翰·哥特弗裡德·施納貝爾(Johann Gottfried Schnabel 1692－1750)和維蘭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 1733－1813)、哈格多恩(Friedrich von Hagedorn 1708-1754)和克洛卜施多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 1724－1803)之間是界線所在”(Schlaffer 2002: 16)。德國文學的真正開端是“萊辛的劇作、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克洛卜施托克、畢爾格(Gottfried August Bürger 1747－1794)、克勞狄烏斯(Matthias Claudius 1740－1815)和歌德青年時期的詩歌”(Schlaffer 2002: 19)。從這一觀點出發，施拉弗爾對德國文學史進行了一番大刀闊斧的刪剪，將它分成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稱為“失敗的開端”，包括“消失的中世紀”和“遲到的近代”；第二部分稱為“成功的開端：十八世紀”，第三部分稱為“接續、回歸和終結”，十九世紀在他看來只是簡單的接續，二十世紀上半葉和十八世紀一樣是一個高潮，然後就走向終結。對施拉弗爾來說，文學史的對象“不是取決於同時代，而是取決於後世，不是時代，而是記憶”(Schlaffer 2002: 153)，主要的取舍標準是審美的標準，即作品的藝術水準(Schlaffer 2002: 153)。文學史的基本原則是“將成功者與失敗者區分開來”，或者說是建立文學經典系列(Schlaffer 2002: 155)。從這一觀點出發，他認為德國文學史始於十八世紀，止於二十世紀，十七世紀以前的德語文學只是文學研究者們的領域，並沒有進入廣

大公眾的視野，對它們的介紹和研究只是增加了圖書館的藏書而已。這種腰斬文學史的做法顯然有些偏激，具有較強的主觀性，它體現出施拉弗爾突出文學史的當代視角，突出文學經典觀這一整體性原則，能夠明顯看出開端—接續—高潮—終結的模式結構，他的文學經典觀的出發點是大眾視角，而不是專家評價，不過依舊是以創作為中心，沒有轉向接受論。這種做法與其說是解決了文學史的難題，不如說是一方面認識到這一難題，另一方面毫不理睬關於這一難題的所有反思，依舊我行我素，沒有提供新的途徑，只是反思之後的老調重彈，從該書的嘗試可以看出文學史家面對困境的無奈選擇，只是施拉弗爾將這一無奈轉化成自圓其說的信念，既然是建構就為自己的建構尋找充足的理由。

與施拉弗爾的整體性視野不同，韋爾貝利的《新編德國文學史》從另一個角度切入，他強調的不是文學史的當代視角，而是文學作品的獨特性和唯一性，他引用保羅·策蘭的詩句“每一首詩都可以確定寫作的日期”作為全書的第一句話，以此突出每個被選擇對象的個性特點。在寫作方法上以編年為序，帶有一定隨機性地選擇文學史乃至文化史上的重要作品，運用跨學科的方法進行描述和分析，撰寫者除了德語文學的研究者之外還有從事英國文學、法國文學、比較文學、哲學、歷史學、藝術史、音樂、戲劇、影視、傳媒各個學科的學者，力圖多視角地展現它們的特殊性，比如寫歌德的一節的標題是“文學的病理學”，描述歌德寫作《少年維特的煩惱》的過程，揭示人物的心理和病理細節（Wellbery 2004：386—393）；寫克萊斯特的一節的標題是“《赫爾曼戰役》和遊擊戰的理念”，談的是克萊斯特的作品與抵抗拿破崙的遊擊戰戰術（Wellbery 2004：505—511）；寫霍夫曼一節的標題是“神秘的、奇異的和理性的界線”，談作家霍夫曼作為法官處理的一起案件與他的創作（Wellbery 2004：521—526）；寫卡夫卡的一節的標題是“卡夫卡的敘事性突破”，從卡夫卡的《判決》聯想到歐洲的政治，特別是俄國與奧匈帝國的關係（Wellbery 2004：693—698）。作者選擇的對象是廣義的文本，除了文學文本之外，不僅包括哲學、歷史、宗教、政治學、法學、心理學和藝術史的文本，而且還包括戲劇、廣播劇、歌劇、音樂和電影的評論。編寫者的主旨不是全面詳細地描述德國文學的變遷過程，而是為讀者提供一個個與文本和作者相遇的機會，不注重連貫性和整體性，而是在意跳躍性和軼事風格，通過一個個標注出具體時間的描述片段勾起讀者的閱讀興趣，吸引讀者去進一步探索和發現。編者為自己的文學史列出了三個前提：首先編者不關心歷史變遷的線索，更關心將不同時期的文學共時地表現出來；其次編者心目中的讀者不是專業讀者，而是跨國界的大眾讀者；再者編者強調通過這些不經意的相遇所體現出來的



奇異效果 (Wellbery 2004: xxii)。通過每篇文章後面的連結指向相關的文章，從而建立起一個相互關聯的文章體系，仿佛是一個巨大的超文本庫。這本書雖然很成功，但是是否可以視為成功的文學史值得懷疑，首先要問的是它在多大程度上還是文學史，無論是收集的資料類型還是脈絡的梳理方法，都沒有滿足文學史的基本規範和要求，與其說是文學史，更不如說是一個另類的資料庫或者百科全書，在強調個體性和避免整體性的同時也失去了文學史本身的關聯性；其次即便是隨意選擇的文本，多學科的方法，多視角的切入，同樣顯示出撰寫的選擇性，體現出撰寫者對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文本體裁的重視程度不同，依舊沒有解決文學史的主觀性和當代性問題，從該書中仍能看到一個隱隱約約的模式，即由一個個瞬間建立起來的連結網絡。

施耐德的《閱讀的社會史》走向另一個極端，他反對用文學經典來搭建具有內在關聯性的文學史，認為“文學史必須符合文學現象的多元性和多樣性，也就是說必須力圖去描述各個接受和創作團體及其各具特色的文學性文化”(Schneider 2004: 7)。從這一原則出發，施耐德主張德國文學史的對象應該是“德國所有文學性文化的歷史發展過程”，所謂文學文化是指“具有時代和階層特徵的、機構化的文學交流實踐”(Schneider 2004: 8)。就時代而言，施耐德放棄了傳統的文學史或者藝術史的分期方法，轉而使用長時段的社會史分期方法，將德國文學的發展過程分為部落時代（約西元前 4 世紀到西元 8 世紀）、封建主義時代（西元 9 世紀到 1789）、市民時代（1789—1918）和民主時代（1918 至今）；就階層而言，他從文學社會學出發，根據不同的歷史時期劃分出不同的社會階層，比如封建主義時代是農民、市民、僧侶與學者、貴族這四個階層；就受眾而言，他關注的不是具體的個人，而是機構化的受眾，即“典型的按照公認的規律和慣例進行的交流實踐”；施耐德的文學概念有自己的特色，他從藝術性的語言加工、虛構性和相對固定的儲存形式三個角度來考察什麼是文學，在他看來，至少要滿足其中兩個要素才能稱之為文學，由此大大擴展了文學的覆蓋面。在這一概念的基礎上，他討論文學的創作、流通和接受。在考察過程中，施耐德尤其強調接受者的角度，他將研究的重點轉向不同時代各個社會階層的文學交流實踐，總結出四種主要的交流形式：社會下層用來緩解身體疲勞和痛苦的補償式文化、社會中層用來達到心情愉悅的消遣式文化、受教育階層用來滿足思想需求的學識式文化和社會領袖精英用來凸顯身份地位的代表式文化，關注文學交流帶來的身體、心靈和思想的效果(Schneider 2004: 14)。由於研究分期的長時段化，研究對象從具體的創作個人移向作為接受群體的社會階層，同時研究文本的範圍大大擴展，這

使得施耐德的文學史或者說文學交流史更加淡化文學作品本身的唯一性，更加突出文學發展的整體性，同時粗線條的長時段研究更加消解了文學自身的規律性，傾向於文學外部的現象與統計，令人懷疑這究竟是文學史，還是社會史；由於接受史研究在材料上難度，再加上長時段研究的概括性，研究的主觀性和當代性更加明顯；將每個時期的受眾簡化為若干個社會階層，尤其是總結出四種主要交流形式，這類方法帶有強烈的模式化的色彩。因此施耐德的文學史嘗試同樣顯示出不足之處。

在考察了德國文學史寫作所走過的道路，再來反思文學史寫作的可能性問題，首先必須區分不同功能的文學史，一類是服務於教學目的的文學史，這類文學史的寫作以資料性為主，按照歷史變遷的順序梳理和總結文學研究領域的已有成果，以作家、作品和相關的背景為線索來勾勒文學變遷的主要脈絡，以傳授知識為主，不追求學術性的高低，文學的歷史性不是這類文學史關注和反思的對象，所以很容易避開文學史的困境；另一類是通俗性的文學史著作，它主要是用通俗易懂的形式來普及文學史知識，對它們更不存在學術性的要求，當然也不會遭遇文學史的困境；最後一類是學術性的文學史著作，即以學術研究為基礎，根據自己的創新觀點撰寫的文學史著作，這類著作不可迴避地要面對文學史的困境問題。

學術性的文學史著作究竟如何寫，這是關係到這類文學史能否生存的根本問題。究其根源，文學史乃至歷史的困境來源於西方思想傳統長期以來主客體對立的二元結構，正是這一二元結構導致了對真實性的追求或者說真實性的夢幻，認為主體和客體相互獨立，主體可以真實地反映或者說再現客體。在文學領域，文學創作的模仿論、文學研究的規律說和文學史理論的真實性都是這一追求的具體體現。實際上主體與客體是物我相生，物我相長，彼此之間是相互產生和相互作用的關係，主體在確認客體的過程中形成，在與客體的相互作用中不斷進行自我調整，同樣客體也不存在所謂的物自體，它是主體認識和作用的結果。笛卡爾通過辨析思考的對象來確認思考的主體，正是這一主客體相生過程的形象體現，只是他忽略了這一過程，而將這一思考的結果當作一個自在的主體——我，得出“我思故我在”的結論。

為了顛覆這一思維定式，從歷史主義的迷夢中清醒過來，考察的對象需要從歷史學的研究方法轉向歷史學家的存在方式，海德格爾的一大貢獻正是在闡釋學中完成了這一轉向，伽達默爾在此基礎上做了進一步的拓展和完善。伽達默爾曾經嘲笑過“追求某個歷史對象的幽靈”的做法，在他看來“真正的歷史對象根本

就不是對象，而是自己與他者的統一體，或一種關係，在這種關係中同時存在著歷史的實在以及歷史理解的實在”，伽達默爾稱之為“影響史”（Wirkungsgeschichte）（Gadamer 1999：305）。理解的過程首先不能否認成見（Vorurteil）的存在，理解是“被誤認為是獨自存在的視域的融合過程”（Gadamer 1999：311），這個過程是一個對話的過程，是自我和他者的對話，傾訴和傾聽的過程，提問和回答的過程，是一個開放的、複雜的、具有多樣性的交流過程，一方面毫不掩飾自己的成見，不排斥分歧的存在，另一方面敞開接納新的視角，尋求溝通的可能性，最終形成新的理解。在這個過程中理解的主體與理解的對象之間不是“我”與“它”，而是“我”與“你”之間的關係，即“真正的交往夥伴（Kommunikationspartner）”（Gadamer 1999：364），伽達默爾將這種關係主要解釋為“彼此的開放性”（Gadamer 1999：367）。這個過程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一個視域交融的過程，另一方面也是主客體交互作用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主客體相生相長，主體的成見或者歷史視域可以看作以往主客體交互作用的沉澱，產生的新的結果具有創新性，又將沉澱為將來的成見或者說未來的歷史視域。歷史的理解過程就是這樣一個主客體不斷互動的過程，它是確定性和多樣性、主觀性和客觀性、過去與未來的統一。

文學史的梳理和寫作過程也是一個類似的過程，在這個寫作過程中，文學史的撰寫者和文學史著作在相互作用中產生，一方面文學的歷史變遷從材料來說從時間到空間都是不可窮盡的，文學史著作的形成是文學史撰寫者對這些材料的不斷篩選過程，另一方面寫作者最初從自己原有的關於文學史的設想出發接觸材料，逐漸確立自己文學史觀的定位，他會根據對材料的閱讀、整理和分析不斷調整自己的寫作，在確認自己的寫作對象的同時確立自己的寫作立場、寫作視角、寫作方法和寫作模式，這是一個作者和作品之間相互生髮、不斷對話和相互影響的過程。

從這個寫作過程來看，文學史必然是寫作者的建構，包含寫作者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文學史寫作不應迴避主觀性、當代性和模式性這一系列歷史學的困境，而應首先坦然承認文學史的撰寫不可避免地帶有寫作者的主觀色彩，每個作者的文學史都是這個作者從自己的文學史觀出發闡釋對文學史的理解；其次承認文學史的撰寫具有當代視角，每個時代的文學史都是這個時代對文學變遷的理解和看法；再者承認文學史的撰寫具有模式性，對文學史的理解總是表現為特定的模式，無論是歷史哲學、歷史主義、形式主義、思想史、社會史或者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各種新嘗試。這些特點並不是文學史著作的缺欠，而是文學史的必

然組成部分。文學史著作就是建構起不同的文學史模式，塑造文學經典或文化記憶。外在於文學史寫作之外客觀存在的文學變遷過程是不存在的，只要試圖去認識和展現這一過程，且不說材料來源是否可靠，僅僅是展現本身就是一個帶著特有的視角去進行篩選的過程。推而廣之，不僅是文學史，其實任何認識過程都是這樣一個不無主觀性、當代性和模式性的過程。

在文學史的寫作過程中，寫作者同樣依賴於建構的對象來建構自身，他以往的文學閱讀和文學研究經歷可以看作他寫作文學史的前期準備，必然影響到他寫作文學史的出發點或者最初的思路，他在寫作中接觸文學材料的源流、理論、作家、作品、體裁、風格、背景、機制等要素，它們作為歷史上文學史認識的沉澱影響到他的文學史架構，這一決定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漫長的不斷地接觸和修正的過程。一句話，他所建構的文學史決定了他的文學史觀，決定了他成為一個怎樣的文學史家。

文學史寫作者和文學史著作之間的關係就是這樣一種相互產生和相互作用的共生關係。其實所謂歷史研究不是再現歷史本身，而是關於歷史的講述，同時也是講述者的歷史。真正的歷史研究過程是一個甄別和選擇歷史研究所使用的材料的過程、審視以往歷史研究傳統或者說歷史闡釋過程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研究者不斷反思自己的研究立場、研究視角、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逐漸定型和成長的過程。因此文學史對脈絡和線索的勾勒是可能的，它們不是再現事實，不是揭示客觀的規律，而是提供經過反思的歷史描述，提供可能的闡釋方向和歷史圖景。在這一過程中闡釋者的身影無法迴避，而且會變得日漸清晰。關鍵不在於有沒有身影，而是在於要意識到這個身影，在描述歷史的同時，要明確地顯露出這個身影，顯露出以往闡釋者半隱半露的身影。

## 引用書目

- Bahr, Ehrhard (1987),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Tübingen: A. Francke Verlag.
- Freytag, Wiebke u. Schönert, Jörg (1998), Literaturgeschichte, in: Hans-Jürgen Goertz (Hrsg.), Geschichte. Ein Grundkurs, Reinbek bei Hamburg: Rowohlt Verlag, 477-495.
- Gadamer, Hans-Georg, Gesammelte Werke, Bd. 1. Hermeneutik 1: Wahrheit und Methode. 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 《真理與方法》,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99. 中譯本：洪漢鼎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 Marsch, Edgar (Hrsg.) (1986), Über Literaturgeschichtsschreibung. Die historisierende Methode des 19. Jahrhunderts in Programm und Kritik,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 Rosenberg, Rainer (2007), Literaturgeschichtsschreibung, in: Klaus Weimar u.a. (Hrsg.), Reallexiko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wissenschaft, Berlin u. New York: Verlag De Gruyter, 458-463.
- Schlaffer, Heinz (2002), Die kurz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Geschichte, München u. Wien: Carl Hanser Verlag.
- Schneider, Jost (2004), Sozialgeschichte des Lesens. Zur historischen Entwicklung und sozialen Differenzierung der literarischen Kommunikation in Deutschland, Berlin u. New York: Verlag De Gruyter.
- Schönert, Jörg (2007), Literaturgeschichte, in: Klaus Weimar u.a. (Hrsg.), Reallexiko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wissenschaft, Berlin u. New York: Verlag De Gruyter, 454-458.
- Wellbery, David E. et al. (2004), A New History of German Literature,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Zmegac, Victor (Hrsg.) (1979),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vom 18. 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 Königstein / Ts.: Athenaum-Verlag.
- 王嶽川 (2001), 《後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 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 貝奈戴托·克羅齊 (1986), 《歷史學的理論和實際》, 北京：商務印書館
- 利奧塔爾 (1997), 《後現代狀態：關於知識的報告》,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韋勒克·沃倫 (1984), 《文學理論》,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海頓·懷特 (2004), 《元史學—十九世紀歐洲的歷史想像》, 南京：譯林出版社